



中美日内瓦会谈与钱学森回国

荣正通 胡礼忠

[摘要] 1954—1955年,处于相互隔绝和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在日内瓦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外谈判,最终就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从两国解密的外交档案来看,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的回国问题是当时中美在平民回国问题上外交博弈的焦点。经过多次试探,中美双方在会谈中逐渐形成了等价交换的默契。钱学森的顺利回国是中方在中美日内瓦会谈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 日内瓦会议;中美大使级会谈;平民回国问题;钱学森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4)03-0056-61

DOI:10.13549/j.cnki.cn11-3959/d.2014.03.010

1954年6月5日,处于相互隔绝和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开始谈判双方平民的回国问题。经过一年多的外交博弈,中美在1955年9月10日最终达成《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就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的声明》。9月17日,被美国政府扣留长达5年的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归途。目前国内已有不少论著介绍中美日内瓦会谈^[1]和钱学森的回国历程,有些论著也利用两国解密的外交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录,对中美日内瓦会谈以及包括钱学森在内的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其中的若干史实尚需厘清。^[2]本文旨在结合两国解密的外交档案,对中美日内瓦会谈与钱学森回国的内在联系进行比较研究,揭示若干被忽视的关键细节,还原某些被误解的历史真相。

一、杜勒斯最初点名不能放钱学森离境

新中国成立后,在华美侨大部分先后回国,少数人因为触犯中国法律而被扣押。朝鲜战争期间,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因为入侵中国领海、领空而被捕。在当时拒不承认新中国的情况下,争取被关押的在华美侨能

够早日回国成为美国政府的难题。1954年3月24日,在指责中国“抓捕并扣留美国人为罪犯”等行为的同同时,艾森豪威尔总统指示国务卿杜勒斯积极采取实际行动来解决问题。^[3]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数千名中国学生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赴美留学。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已有千余名留美学生响应号召,陆续回国参加建设。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出于安全利益和遏制中国的战略考虑,援引多种法律和法规禁止中国留学生返回大陆。钱学森的回国问题是其中最典型的案例。^[4]经历抗美援朝战争后,新中国急需以钱学森为代表的旅美科技人员回国参加国防建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美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都有通过谈判使本国侨民得以顺利归国的需求,而195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为中美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接触机会和场所。

对于双方平民的回国问题,中美在接触前都进行了专门的准备。在得知新中国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消息后,部分留美学生联名写信给将要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反映他们回国受阻的问题,以便中国代表团在提出留学生的回国问题时,可以拿出这些信件作为证据。^[5]1954年4月18日,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

团综合组草拟了《关于美国政府扣留虐待我国留学生发言(初稿)》,其中不仅对美国迫害、监禁、扣留中国留学生的行为进行了控诉,而且选择了钱学森、汪良能等人的具体事例作为证据。^[6]当时周恩来认为,在美国对华政策相当敌对和僵硬的条件下,可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释放被押在华美侨的愿望,开辟接触的渠道,寻求改善两国关系的可能性。美方则预计释放部分在美华侨能够换取中方释放在华美侨,因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在日内瓦曾对记者说:“因为美国扣留了50个中国留学生,所以中国关押了那些美国囚犯作为人质。”^[7]5月13日,杜勒斯在发给美国代表团的电报中说:美国政府决定对滞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重新进行评估,未来只扣留那些如果放回中国大陆将会对美国国防安全造成威胁的留学生。初步的调查显示大部分被禁止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将被允许回国。^[8]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美方于5月19日通过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作为中间人同中方进行接触。周恩来获悉后决定不拒绝接触。5月21日,杜勒斯在发给美国代表团的电报中说:那些现在根据行政命令限制离开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未来在服从美国法律和法规的前提下,将被允许返回中国大陆。他确信只有极少数想回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从而将被继续扣留。^[9]5月26日,黄华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在华美侨问题,并指责美国无理扣押中国侨民。5月27日,中方表示愿意就在押美侨问题同美方进行直接谈判。6月3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认为在谈判中将“首先联系到中国留学生被扣问题”,也阐明中国将区别对待犯法的美国侨民和其他美国人。^[10]鉴于同中方的直接会谈可能被认为是美国走向对新中国外交承认的开始,杜勒斯曾在谈与不谈之间难以抉择。6月3日,总统新闻秘书哈格蒂提醒他:“美国要采取任何可能的步骤寻求在华美侨获释回国,没有什么比保护美国公民更重要的了。”^[11]于是,杜勒斯在当天同意双方直接谈判平民的回国问题。从6月5日到21日,美方代表、时任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与中方代表、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共进行了四次会谈。在此期间,周恩来于6月11日致电中共中央并告公安部、外交部:如果美国改善对我留学生之待遇,准许他们回国,届时看情况,我方也可考虑批准几个美国侨民出境,或将几个犯罪被监禁的美侨驱逐出境。^[12]

1954年6月15日,中方在第三次会谈中提出在美华侨的回国问题。约翰逊承认美国政府依法阻止了

120个中国留学生返回大陆。王炳南随即控诉美国政府迫害和监禁中国留学生的暴行,并列举了钱学森、赵忠尧等5人被关押或逮捕的案例。^[13]6月16日,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副国务卿史密斯在发给国务院的电报中指出:如果美国先释放一些目前被扣留的中国留学生,中国释放在华美侨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他建议先释放10—15个中国留学生来试探中方的反应。^[14]6月17日下午,杜勒斯在给司法部长小赫伯特·布劳内尔(Herbert Brownell)的电话中谈了关于先释放10—15个中国留学生的问题。布劳内尔说调查结果显示在124名中国留学生中只有一个人不能放回中国大陆。杜勒斯同意将来允许另外123个中国留学生回国。^[15]当天晚上,杜勒斯在给美国代表团的电报中说:“基于非正式审核的结果,国防部至今只发现有一个人不能被允许离开美国。这就是钱学森。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导弹专家,也是你们提交的名单上的第一个人。他不再想离开美国。名单上的124人中的57人明显想要返回中国大陆。”^[16]杜勒斯在电报中说可以允许其他中国留学生离美,唯独不能允许钱学森离美。这说明当天下午的电话中提到的那个不能放回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正是钱学森。

在中美日内瓦会谈初期,因为美方认为钱学森对美国的国防安全构成了重大的潜在威胁,所以不愿将他作为与中方进行交易的筹码。当时,美方对内以法令禁止钱学森离美,对外则宣称他不再想离开美国。由于美方既不肯放钱学森回国,也不愿意大规模地允许其他中国留学生回国,而中方不肯轻易地释放在押美侨,所以双方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中美双方在日内瓦举行的领事级会谈也一度没有大的进展。

二、艾森豪威尔最终同意放钱学森离境

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不仅导致中美面临热战的危险,而且使美国在华间谍案也逐渐升温。1954年9月12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在沪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人雷德蒙判处无期徒刑。11月23日,中国最高法院对1953年1月12日驾驶间谍飞机入侵东北的阿诺德等11名美国飞行员分别判处4至10年徒刑,同日对1952年在东北从事间谍活动的唐奈和费克图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20年徒刑。这一切给美国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主导下16国共同起草的决议,要求联合

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采取行动,寻求上述 11 名美国飞行员及其他同类在华人员的获释。

1955 年 1 月,哈马舍尔德在北京与周恩来就释放美国飞行员问题进行了四次会谈,最终得到了中国愿意解决间谍问题的表示。美方对哈马舍尔德的调停结果并不满意,因为没有得到中方关于释放美国飞行员的承诺。当时,周恩来邀请在押美侨的家属前往中国大陆探监。哈马舍尔德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艾森豪威尔却不愿意让家属去中国大陆探监,也不同意给美国记者发放去中国大陆的护照。^[17]由于美方与哈马舍尔德在探视问题上发生矛盾,美方开始试图直接采取行动,促使中方放人。1955 年 2 月,杜勒斯决定遣送 7 个大陆渔民^[18]回国,想以此来推动中方释放被关押的美国飞行员。^[19]

1955 年 2 月 28 日,美方在日内瓦领事级会谈中对中方此前释放了 16 个美国人表示满意,中方则表示愿意给想前往中国大陆探视亲属的美国人发放签证。3 月 31 日,中方向美方抗议:美方曾三次保证允许 27 名中国留学生回国。然而,至今只有 10 名留学生回到祖国。在 5000 多名中国留美学生中至少有 316 人申请回国,美方继续阻止他们回国是不公正的。美方则认为中方的指控是不符合实际的,要求中方提出具体的案例。对此,中方指出:在 1954 年 8 月和 9 月,共有 35 名中国留学生致信艾森豪威尔总统,请求他允许他们返回祖国。然而,他们的申请至今未被批准。还有 31 名中国留学生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请求他支持他们返回祖国与家人团聚。但是,美国政府在这件事上再次无所作为。^[20]

1955 年 4 月 1 日,杜勒斯在写给艾森豪威尔的备忘录中表示:释放部分中国留学生有利于美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向中国大陆施压,迫使其释放在华美侨。国务院不反对移民和归化局释放那些符合条件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同意取消对 74 名中国留学生的回国限制。然而,那些受过技术训练的中国留学生要继续按照移民和归化局在 1952 年 6 月 27 日出台的规定进行筛选。按照现在的标准,他们中间只会有少数人不符合允许回国的条件。^[21]1955 年 4 月 8 日,美方告知中方美国政府已经释放了另外 76 名中国留学生。中方则质询了分别给美国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写信的中国留学生的近况。美方坚称除了那些等待审核的人外,没有一个想回国的中国留学生被扣留。^[22]

1955 年 4 月 23 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期间郑重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对此,美方

也表露出改善双边关系的意愿。^[23]5 月 19 日,周恩来在会见前来斡旋的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农时指出,对“要求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其他中国侨民,美国应不加限制,让他们有自由回来。”^[24]中国政府在 5 月 24 日决定将 4 名美国飞行员驱逐出境。美方获悉后于 5 月 30 日在日内瓦会谈中对此表示欢迎,同时希望其他美侨也能尽快回国。美方还根据 5 月 14 日的国内指示声明:所有针对想回大陆的中国留学生的禁令已经被撤销,除了两个不再想离开美国的中国留学生。^[25]

美国政府一再禁止家属探望在华美侨的行为引发了部分美国民众的不满,而第一批美军战俘的获释使美国民众更加关注其余在华美侨的命运。当时大多数美国民众希望政府在平民回国问题上继续与中方做交易。面对日益加重的国内政治压力,1955 年 6 月 10 日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在华盛顿做了一次重要的谈话。杜勒斯想把仍被关押的美国飞行员与中国侨民问题区分开来,认为美国没有义务必须送还中国留学生。艾森豪威尔则认为:当那些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时,他们默认自己将被允许返回祖国。我们应该让所有的中国留学生回去。杜勒斯指出:国防部认为有两个中国留学生不一定适合放回中国大陆,因为他们掌握了高度机密的信息。艾森豪威尔认为这不应该成为障碍,觉得他们掌握的信息可能没有美国政府认为的那么有价值。杜勒斯最后表示将进一步研究这件事。^[26]

6 月 11 日,杜勒斯在给负责国防事务的副国务卿安德森打电话时表示:总统在昨天与他谈话时情绪激动,表现出让中国留学生全部回国的态度。杜勒斯催促国防部在必要时与总统讨论这个问题,并在梅农到达华盛顿前搞清这件事。同日,美国国防部专门开会讨论这两个中国留学生的回国问题,然后向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6 月 13 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国防部的决定,即同意释放他们离境。^[27]国防部认为:“如果钱学森被获准离境,带走的不仅是他在其专业领域的卓越建树,还有可以应用于制造武器的喷气推进技术背景知识,以及解读美国科技进展的非同寻常的领悟力。”然而,国防部官员们承认:“他当时掌握的军事机密很可能已经被后续研究所超越,或者已经为苏联人所知。”^[28]

因为杜勒斯直到 6 月 29 日才获悉艾森豪威尔在 6 月 13 日的决定,所以他在 6 月 14 日与梅农谈话时关于钱学森回国问题的立场仍不明确。当时,梅农建议美国释放所有想回国的中国留学生来缓和紧张局势。杜勒斯回答:“我们经过深思熟虑扣留了一个中国留学

生,因为他掌握了高度机密的材料并且不正确地使用了它。然而,美国政府在特定情况下会撤销这个禁令,如果这么做有助于(解决在华美侨问题)。”^[29]根据1954年6月17日的电报,杜勒斯在与梅农的谈话中提到的那个中国留学生是钱学森的可能性更大。1955年7月6日,杜勒斯在国务院与梅农等人会谈。梅农再次询问杜勒斯:美国政府是否允许所有在美华侨自由地返回中国。杜勒斯回答:“你的判断是正确的,只是在一个或二个案例中可能还有些问题悬而未决。”^[30]由于当时杜勒斯知道总统已经同意放钱学森离境,他的这番表态说明此时这两个中国科学家已经转变为待价而沽的谈判筹码。周恩来则在7月7日接见印度大使赖嘉文时指出:“中国释放了四个美国飞行员,但美国在中国留学生的的问题上并没有作适当表示。”^[31]

在原则上允许所有在美华侨离境后,美国政府最终决定把中美日内瓦会谈的级别从领事级提高到大使级。7月11日,杜勒斯请英国驻华代办代表美方向中方口头转达上述意愿。7月15日,周恩来在会见新任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时表示接受美方的建议。经过一系列的磋商,中美双方在7月25日发表了中美两国同意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的新闻公告。

三、钱学森的求援信与中美大使级会谈

自从被禁止离美后,钱学森不仅行踪被监视,而且往来的书信都受到拆检。当时他不清楚中国大陆的现状,中国政府也不知道他的现状。1955年6月,钱学森夫妇偶然从送菜的篮子里得到一本1955年5月号的《中国画报》英文版。画报中有介绍中国五一节的报道,其中有他们熟悉的陈叔通^[32]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照片及说明。钱学森一直在关注中美日内瓦会谈的消息,从报纸上得知中美有交换被扣侨民的可能,而美方表示已经释放了所有希望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于是,他在6月15日给陈叔通写了一封求援信,说明自己回国受阻的真相。信的附件是1953年3月6日《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报道中说:美国政府在3月5日下令驱逐钱学森回中国,但同时又不许他离开美国,因为他的离境不符合美国的最高利益。

钱学森夫妇设法将这封信寄给远在比利时的蒋英的妹妹蒋华,蒋华又将这封信转寄给钱均夫。1955年7月7日,钱均夫致函陈叔通,并附寄钱学森的求援信。很多学者认为,陈叔通直接把求援信交给周恩来,周恩

来看过后把信转给王炳南,并指示他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以此为证,迫使美国政府最终同意放钱学森离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7月11日,陈叔通将钱学森的求援信交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7月12日,竺可桢致函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稼夫,请他设法帮助钱学森回国。7月17日,张稼夫致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报告了钱学森写信求援的有关情况。7月21日,陈毅批示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请外交部想办法协助钱学森回国。

1955年7月29日,中国外交部美澳司司长徐永焕致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部长助理乔冠华,汇报美国扣留钱学森的有关情况和初步处理意见。处理意见如下:“钱学森是喷气式飞机和火箭专家,在美国有相当地位,因此估计美国可能还不会轻易放他回来。但是,由于四大国会谈后,国际局势一般趋于和缓,美国又终于接受了周总理在万隆会议所宣布的中美直接谈判的建议,因此也有放他回来的可能,或以放钱作为对我释放更多一些美国在华人员的相应行动。如在会谈开始时已有钱回国的消息,则会谈中当然不提此事。如尚无被放回的消息,则我方应在此日内瓦会谈中谈到我留学生和侨民问题的时候,具体问美方关于钱的情况和是否放他回国。如对方作肯定答复,此问题即不再提。如不肯定,则提出释放的要求,如说不放,则用说理态度,而坚持释放的要求。以上是否有当,请予批示。”8月2日,乔冠华批示:同意所呈意见。^[33]

1955年7月31日,为表示中方对中美大使级会谈所持的诚意和积极态度,中国最高法院在周恩来的部署下,判决提前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同日,周恩来在接见赖嘉文时表示:中国此举是为了便于梅农在日内瓦推动美国方面允许中国侨民自由回国,希望美国在行动上有所响应。^[34]8月1日,王炳南在第一次会谈中宣布了中国在前一天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的消息,并说他们将在8月4日抵达香港。约翰逊对此表示感谢,认为这将有利于谈判的进行。^[35]

8月2日,王炳南在第二次会谈中指出:长期以来,由于美国政府的限制和造成的困难,在美华侨不能自由返回他们的祖国。约翰逊按照杜勒斯在7月29日的指示做出保证:没有一个中国留学生被阻止离开美国。他要求王炳南提出中国留学生被阻止回国的例子,以供他立即展开调查。对此,王炳南表示他将在下次会谈时回答这个问题。^[36]约翰逊在回忆录中说王炳南没有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任何证据来反驳美方的声明。^[37]在外交部此前发给中国代表团的《关于侨民与留

学生问题会谈发言稿(第二次)》中也没有提到钱学森回国受阻的案例。

8月3日,中国外交部致电王炳南,指示他在第三次会谈中准备提出在美留学生的总数和一些典型的留学生被扣案例。电报附有对方限制留学生回国实例的发言要点,但没有提到钱学森。约翰逊在8月4日下午发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没有提到钱学森。8月5日,杜勒斯在发给约翰逊的电报中也没有提到钱学森。8月4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和归化局致函钱学森:^[38]司法部1950年8月23日的命令已经撤销,你现在可以自由地离开美国。王炳南没能及时获悉此事。

8月5日下午,徐永焕起草完《关于钱学森的例子》,随即请乔冠华审阅。^[39]这份报告介绍了钱学森写求援信的来龙去脉。8月7日,中国外交部再次致电王炳南,电报的(附件二)就是《关于钱学森的例子》。^[40]根据国内的指示,王炳南在8月8日的第四次会谈中详细地介绍了钱学森给陈叔通写信求援的案例,以此证明仍有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国受阻。对此,约翰逊郑重声明:包括钱学森在内,美国政府禁止中国留学生返回大陆的限制已经全部撤销。^[41]

虽然钱学森的求援信可以用来驳斥美方声称早已不再限制在美华侨回国和钱学森已经不想离开美国的谎言,但是在中方公布钱学森的求援信前,钱学森已经获准离美。因为11名美国飞行员抵达香港的日期和钱学森获准离美的日期是同一天,所以美方通知钱学森可以回国是对中方释放这批飞行员的积极回应。几十年后,约翰逊在接受采访时承认钱学森的离开的确是一场交易的一部分。他指出,钱学森和其他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是用来交换美国在华滞留人员的“关键筹码”。^[42]上世纪50年代末,周恩来曾评价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43]

四、结语

在中美日内瓦会谈中,钱学森既是中方设法营救回国的首要目标,也是美方在后期用来换回被俘飞行员的关键筹码。影响美国政府是否同意钱学森离境的因素首先是是否对美国的国防安全构成潜在的巨大威胁,其次是中国政府是否愿意为交换钱学森付出足够的筹码,再次是美国民众是否希望政府在平民回国

问题上与中方做交易。艾森豪威尔的果断决策奠定了解决钱学森回国问题的基础,周恩来的大胆决策促成了该问题的最终解决。在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谈判中,中美双方逐渐形成了一种等价交换的默契。

中美在日内瓦会谈中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外交博弈实质上是对中国留美科技人才的争夺。在谈判过程中,中美领导人都在不断地权衡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最终,美国领导人认为解救被俘的飞行员所带来的国内政治收益大于释放钱学森所产生的国防安全风险,而中国领导人为了获得解救钱学森带来的国防安全收益,甘冒国内政治风险而提前释放被俘的美国飞行员。钱学森的顺利回国是中方在中美日内瓦会谈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注释]

- [1] 本文中的“中美日内瓦会谈”是指中美双方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举行的会谈、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在当地举行的中美领事级会谈以及从1955年8月1日开始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 [2] 王炳南曾回忆说:1955年8月2日,他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上举出钱学森写信求援的例子来批驳约翰逊。参见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八)[J],《世界知识》1985年第2期,第20页。学者们根据王炳南的回忆普遍认为是钱学森的求援信迫使美方允许他回国。参见翁明:《王炳南助钱学森回国》[J],《海内与海外》1995年第8期,第25页;涂元季:《人民科学家钱学森》[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吕春:《周恩来用美国战俘交换钱学森》[J],《炎黄春秋》2006年第4期,第64页。中美两国解密的外交档案显示事实并非如此。
- [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FRUS), 1952—1954, Vol. XIV, China and Japan, part 1,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5, doc. 180, pp.396-397.
- [4] 钱学森在1942年至1950年参与了美国多种火箭导弹的研制工作,是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春开始通过多种渠道秘密动员他回国效力。1950年8月下旬,钱学森一家回国受阻,美国政府禁止他出境。9月7日,钱学森遭到美国司法部的拘禁,随后被关押在特米诺岛的移民局拘留所。后经多方努力,钱学森被朋友以1万5千美元的重金保释。10月,美国司法部移民局指控钱学森为美国共产党员,属非法入境;根据美国国防安全条例规定,应被驱逐出境。因为钱学森之前的研究大量涉密,在美国军方的压力下,对他的驱逐令长期没有执行。
- [5] “美国政府强迫扣留我国留学生情况”,外交部档案,档号206-00099-07。
- [6] “关于美国政府扣留虐待我国留学生发言(初稿)”,外交部

- 档案,档号 206-00053-05。
- [7] [8] FRUS, 1952-1954, Vol. XIV, China and Japan, part 1, doc.189, pp.416-417.
- [9] FRUS, 1952-1954, Vol. XIV, China and Japan, part 1, doc. 195, p.427.
- [10] [12][24][31][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75页,第376页,第479页,第493页,第495页。
- [11] FRUS, 1952-1954, Vol. XIV, China and Japan, part 1, doc. 205, p.442.
- [13] “王炳南与美方代表约翰逊关于中美两国侨民及留学生回国问题的第三次会晤谈话记录”(1954年6月15日),外交部档案,案卷编号:206-C063,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90—396页。另参见FRUS, 1952-1954, Vol. XIV, China and Japan, part 1, doc.214, pp.468-469.
- [14] FRUS, 1952-1954, Vol. XIV, China and Japan, part 1, doc. 215, p.472.
- [15] FRUS, 1952-1954, Vol. XIV, China and Japan, part 1, doc. 217, p.474.
- [16] FRUS, 1952-1954, Vol. XIV, China and Japan, part 1, doc. 218, p.475.
- [17] FRUS, 1955-1957, Vol. II, China, doc. 13, p.35.
- [18] 1954年5月,美国空军在西沙群岛搭救了7个遇险的中国大陆渔民,随后把他们安置在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
- [19] FRUS, 1955-1957, Vol. II, China, doc. 113, pp.277-278.
- [20] FRUS, 1955-1957, Vol. II, China, doc. 183, pp.435-438.
- [21] FRUS, 1955-1957, Vol. II, China, doc. 187, p.443.
- [22] FRUS, 1955-1957, Vol. II, China, doc. 198, pp.468-469.
- [23] 1955年4月26日,国务卿杜勒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愿意就停火问题和中国共产党人对话,然而,美国不会背着中国国民党讨论它的权利。参见[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著:《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三)》[M],樊迪、静海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页。
- [25] FRUS, 1955-1957, Vol. II, China, doc. 263, p.585.
- [26] [27] FRUS, 1955-1957, Vol. II, China, doc. 266, pp. 588-589.
- [28] [42] [美]张纯如著:《蚕丝——钱学森传》[M],鲁伊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页,第214页。
- [29] FRUS, 1955-1957, Vol. II, China, doc. 270, p.601.
- [30] FRUS, 1955-1957, Vol. II, China, doc. 288, p.634.
- [32] 陈叔通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是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和钱学森的岳父蒋百里在求是书院时的老师。钱学森夫妇因此称陈叔通为太老师。
- [33] “关于美国扣留我国科学家钱学森事及有关情况处理意见报告”,外交部档案,档号 111-00081-03。
- [35] FRUS, 1955-1957, Vol. III, China, doc. 1, pp.1-3.
- [36] FRUS, 1955-1957, Vol. III, China, doc. 4, pp.7-9.
- [37] U. Alexis Johnson with Jef Olivarius McAllister, *The Right Hand of Power*,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84, p. 243.
- [38] 钱学森在《我在美国的遭遇》一文中说自己在8月4日接到美国政府的通知,参见《人民日报》1956年1月6日。他在《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一文中说自己在8月5日接到美国政府的通知,参见《光明日报》1989年8月6日。
- [39] “附件(二)关于钱学森的例子”,外交部档案,档号 111-00072-06。
- [40] “覆互相派人视察问题及两发言稿”,外交部档案,档号 111-00015-07。
- [41] FRUS, 1955-1957, Vol. III, China, doc. 12, pp.19-20.
- [43]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八)[J],《世界知识》1985年第2期,第21页。

作者简介:荣正通,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 2013 级博士研究生,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员。

(上海,200083)

胡礼忠,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14-02-25

修改日期:2014-03-24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49 Strategic Choice for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Arctic Affairs: Analysis Based on SWOT Approach

by Sun Kai & Wang Chenguang

In recent years, rapid changes in the Arctic also attracted China's attention, and China is participating in Arctic affairs actively, but there is no Arctic Strategy for China at present. Analysis on the basis of SWOT approach provid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and threat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Arctic affairs. China should choose the strategy of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Participation in Arctic affair is also part of China's dream of becoming a strong maritime power, and thus a matching and visionary strategy is imperative.

56 Sino-US Geneva Talks and Qian Xuesen's Return

by Rong Zhengtong & Hu Lizhong

From 1954 to 1955,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were hostile to each other at that time, had their diplomatic contacts in Geneva and finally came to an agreement on civilians' return to their respective homeland. According to the declassified files, Qian Xuesen's return was the focus of the Sino-US diplomatic talks on civilians' retur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gradually formed a kind of tacit understanding in the bargain. Qian Xuesen's return, which is the major achievement that China made in the Sino-US Geneva talks, has far-reaching historical influence.

Theoretical Probes

62 Identity, System and Goal: the Theoretical Arguments of Russia

by Liu Sisi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tarted to develop in Russia, but Chinese scholars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its development. Compared with American and Britis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Rus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t is related to Russian history, culture and tradition,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Russia's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ir debates on the role-identity,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goals of national strategy.

68 Ethnic Conflict: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ecurity Dilemma

by Jiao Bing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Dilemm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n be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domestic ethnic conflict. When the central authority of a state is declining, internal politics will be deteriorated into the state of anarchy. In this environment, a variety of ethnic groups within a state will be forced to seek ethnic security in a self-help system. The security attempts of one ethnic group will be frequently regarded as the threat to another ethnic group which will then be activated to take countermeasures. As a result, the spiral model of security dilemma will occur among these ethnic groups. Under the ethnic security dilemma, solidarity of ethnic groups, geopolitics and window of opportunity induced by power transition will make preemptive attack the optimal strategy for any ethnic group. Therefore, ethnic conflict will probably take place in the offense-dominated security dilemma.

Countries and Regions

73 On the Political Capital and the Party Structure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by Xu Wansheng & Li Shuo

Political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the Party structure of Japanese political parties. It shows the DPJ's support groups,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political status and policies, etc.. In terms of support groups, the DPJ's income is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dues of party members. Fund support from the labor union is mainly geared to individual politicians. Thus DPJ is unable to obtain large donations from enterprises and organizations.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DPJ is weak in raising fund and loose in organization. Politicians with strong ability to raise capital are good at benefiting from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tical funds in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In terms of ruling status, the DPJ, by virtue of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membership dues, deals with the national election through increased political activity expense, but it cannot control the election results. In terms of political policies, the DPJ had been working to promote political capital reform before being the ruling party. However, the frequent revelation of political capital events after it held power leads to unrest and opposition within the DPJ.